

河南文史通讯

1986 1 (总第3期)

目 录

	杨成武等同志对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 (1)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和任务.....黄 森 (6)
文史会议	全国政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一 明 (18)
	中南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第四次协作会议纪要..... (20)
	张钊回忆录会稿会议纪要..... (24)
	任雷远同志对文史工作的意见..... (26)
	省政协一九八五年文史资料工作基本情况和一九八六年的设想.....宫振民 (28)
工作经验	安徽省政协文史出版物发行工作情况.....安徽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34)
	我们是怎样做好文史资料工作的.....政协邓县委员会 (39)
	宝丰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情况.....政协宝丰县委员会 (42)
	愿献余热为文史.....曹弃疾 (44)

河南大旱灾期间郭仲隗与徐堪的一场争吵	
文史资料	沈重字遗稿 沈元加整理 (47)
我所知道的黎广诗	
选 载	张宗衡 (49)
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增补新委员	
(52)	
文 史 动 态	任雷远同志召开老年人座谈会 (19)
	延津县政协召开文史资料撰写人座谈会 (23)
	临汝县政协召开文史会议安排八六年工作
	(54)
	通许县政协召开文史座谈会 (54)
《河南文史资料》今年出版17至20辑 (25)	
· 文史书札 ·	
任秀霞致袁蓬函 (53)	
孙治鼎、傅子良逝世 (46) (33)	
致作者 《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 (17)	

杨成武等同志对开展文史资料 工作的意见

〔原编者按〕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下午，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工作会。会议主要是听取文史办公室最近工作情况的汇报。杨成武主任，张磐石、杜建时副主任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文史办公室主任兼文史资料出版社总编辑张文惠、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兼副总编辑黄霭玲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分别就文史办公室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多渠道发行、加紧“抢救”文史资料等问题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汇报。针对文史办公室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杨成武等同志提出了一些意见，现整理出来供各地参考。

一、文史出版物的质量亟待提高

杨成武同志说，提高文史出版物的质量是项很重要的工作，要下大力气去抓，做到精选精编。有许多老人，年岁大，记忆力减退，过去的事情本人记不清、说不准，这就需要我们去工作，在编选资料时，要认真地核实。

张磐石同志说，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步子迈得慢一点、稳一点，尽量把工作搞得好一点、精一点。出版的文史资料要符合历史事实，要讲得公道，让人能够看得下去。过去在军

事方面，讲抗战不大愿讲两个战场，这两个战场到底有没有呢？实际上是有的。现在讲抗战，又有人不愿讲摩擦，摩擦也是有的。要注意分寸，要尊重历史事实。现在文史办公室准备集中精力做好主要工作，方法是好的。

杜建时同志说，提高质量，这种做法符合文史工作的中心。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史工作的面铺得广了，人员也大大增加了，出版的东西越来越多。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事业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出版物中，重复的东西多了些。现在办公室决定狠抓质量问题，以求出版物的质量高一些、精一些，我完全同意这种作法。

孙轶青同志说，要把质量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抓。搞文史资料工作要注意全面地看问题，注意克服“左”的东西。今年是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准备出一套抗战史料丛书，在选择抗战史资料时要注意做到精选、精编。过去不讲两个战场，这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今天再搞抗战这段历史，就要注意克服过去那种片面性，要适当宣传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好的事迹及一些爱国将领对抗日的贡献，但也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忽视了敌后战场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

二、注意搞好文史出版 物的发行工作

杨成武同志说，要把文史资料读物送到读者手里，一方面应当通过新华书店，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各地文史书店及发行点进行，单靠新华书店是不行的。前些时候我到南方去，

碰到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最近买了一本好书。”我问什么好书，他说是《聂荣臻回忆录》，并说这本书是托人在北京的新华书店买的。经过好几个地方，我才知道有的地方见都没见过这本书。可见，发行工作搞不好，许多真正需要书的读者是买不到的。

张磐石同志说，搞好发行工作确实很重要。新华书店征订图书只是个估计数字，有很大限制。就以这次政协大会期间到香山饭店等处售书受到欢迎一事来看，确实需要多渠道发行。我们出的史料书大都是以亲身经历写成的，社会上有许多人是很喜欢看的，可是在新华书店、内部书店最近已很少能看到这些书了。要使文史资料出版物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为扩大影响而发些广告，适当地做些宣传还是可以的。

孙轶青同志说，发行工作多渠道是可行的，但要使文史读物打开销路，最根本的还是提高质量的问题。一本书好不好，有没有销路，要看书本身的科学性、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内容好、质量高，再加上做好发行工作，这样销路自然就会打开。

三、文史资料的“抢救”

工作还需抓紧

杨成武同志说，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很重要，需要大家去跑、去做工作。要一个一个地拜访，先分批去，把理由向他们讲出来：周总理对此早有号召，希望这些老人能把自己一生的东西写出来，留给下一代。言谈话语要有说服力，要讲道理，一次解决一两个问题，慢慢来，工作是可以

做好的。当然，工作是很艰苦的。邓大姐讲过，搞征集工作不能强迫人家写。写回忆录的问题，由上面提出号召要人家写，怕不大行，也不大好讲。因为讲某一阶段的事、谈某件事容易，要写自己的一生比较难一些，有的东西不大好写。征集资料不必求全，写一个时期、一部分的片断就可以。人家愿意写哪一段历史就写哪一段，一段一段地搞，把一件事情搞得有头有尾也很不错，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历史。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没有缺点错误，人一生中的失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人家不愿写失误的那一段，就不要去强迫；愿写自己光荣历史的，就写这一段。特别是有些人一生当中的起伏比较大，前期后期一起一伏，一动笔就写自己的一生，很难办到。武则天的“无字碑”，大家都知道。武则天在一生当中做了不少好事，她想做成的一些事，主观上似乎是想使老百姓丰衣足食，但她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据说，她不愿为自己树碑立传，连死后的墓碑上也不许人刻字。千秋功罪，让后人去评说。因此，有些人不愿写自己。总之，“抢救”的方法多种多样，要靠大家去摸索，去实践，不要强迫，要让人家自觉自愿地去写。

张磐石同志说，文史资料工作本身就带有“抢救”的性质，但在征集资料的过程中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使人觉得你是在“抢救”他。有的人愿意写，有的人不愿写，不愿写的人见写的人讲的事情有出入，不合当时的历史，也会憋不住拿起笔写的。目前的来稿有所减少，这是事实，但在征集稿件时，仍要注意不要猎奇。文史资料讲的是史实，不要搞花样，实实在在地讲清问题，就会产生影响。征集资料的范围还可以扩大些，不见得非局限在这些人。“抢救”工作要抓

紧，但不要强迫，人家不愿说就不要强迫，这一点要注意。

杜建时同志说，“文革”前，我们出的五十五辑文史资料里面都是一段一段的史料，所以让人写回忆资料，不一定要写整个的历史。过去一个月收到的稿子就很多，最多时达到一千份，现在收到的稿子少了，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写材料的人老了，不愿再动笔写或自己不能动笔写了；二是有不少写稿人在“文革”时受到了冲击，他们写的史料被拿去作罪证，有的人对此还心有余悸，不愿为自己招惹是非。这样就给我们征集资料带来了困难。虽然有困难，但我们还是要“抢救”。怎样抢救？我认为要有主动性，不主动不行。如何主动？可以试验一下，如登门拜访、发函等等，都可以试一试。本人不能写的，可以请他提供线索，介绍可以写的人，总之是要积极主动地派人去找、去联系。

孙铁青同志说，“抢救”老人的资料是项很重要的工作，时间要抓紧，但方法要适当。征集资料，通过文史资料出版社向外约稿、订合同，方法比较恰当。各人情况不同，有的适合写，有的不适合，领导出面请他们写，弄不好容易被动，因为这些老人大多已转二线工作。中央也没有号召党内老干部都写回忆录。“抢救”资料要有调查，对对方要有个必要的了解，看看他能写哪部分、哪一段的资料，提出恰如其分的要求，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征集的范围可以扩大些，凡是有可能征集到的，就要尽快地把它征集来。这个工作很细致，要采取一个个进行工作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还是可以搞到一批资料的。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原载全国政协《文史通讯》1985年第3期。）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 作的性质和任务

黄 森

【原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办的文史干部培训班上发言的讲稿，现全文刊登出来，供各地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在内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的体系。二十五年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中断了十二年），在各级政协、历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征集文史资料达四亿多字，出版史料一亿多字。这样大规模地、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史料征集工作，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项工作在自身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它的独特个性，为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1. 政协文史资料与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不同，它是一种口述资料，是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记述。

口述资料在历史资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在大动荡时期，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火连绵不断，政权几次更迭，文书档案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在迁徙中流失，有的则限于当局的立场，记录不完全客观，甚至有的是失实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弥补文书档案之不足，有的甚至可以匡正历史文献的谬误。一九六五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政协常委会议上，推荐《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袁世凯如何玩弄权术挟制当时的内阁总理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这件事发生在袁世凯办公室里，只有袁、熊二人知道，在文献上是不可能记载的。现在由熊的密友郑廷玺以回忆录形式发表出来，就补充了历史文献之不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2. 政协文史资料与专业性资料（如工运、青运、妇运资料）相比，具有范围广、内容多的特点，它是综合性的近代史资料。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以至三教九流等各个方面。因此，它可以为各有关部门广泛利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有两位老人曾写过我国公路建设的史料，长时间里我们未加利用，一九八一年交通部为写中国公路史，跑遍全国无觅处，最后在我们资料库里找到了这份材料。八一电影制片厂从我们资料库里找到了胡宗南军歌的歌词，如获至宝。

3. 政协文史资料部门也与一般史料部门不同，它是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政协章程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大家知道，政协文史资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茶话会上提出来的，当时，他希望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知识经验留下来，传之后代。他的号召得到委员们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至今已有六万多人次提供了资料。通过撰写史料，大家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欺侮，内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惨境，以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程，个人曲曲折折的经历，从而进一步认清时代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通过事实更进一步明确过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拯救了中国；今天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才能振兴中华。

4.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仅向史学界提供研究资料，而且还直接

出版了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历史知识读物。我们的史料是来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不但记事，而且记人，有具体生动的情节，真实可信，令人喜读，可收到一般史料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也许还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总起来说，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各级政协领导下，运用统战工作的形式，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研究、出版口述资料的史料工作部门。它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

第一，征集史料。

这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任务。征集的时限上起清末戊戌维新，下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范围如上所述，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二十五年来，我们采取广征博集的方针，已征集了大量资料，但各个门类、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一般地说，军事、政治方面资料较多，其他方面较少，尤其是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空白点甚多。今后如何进一步征集，要从各地的情况出发，确定各自的主攻方向。有的地方反映现在稿源已日趋枯竭。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同过去比较，现在来稿下降了，这是事实，但不能说已无潜力可挖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近、现代史那么丰富，决不是几亿字可以囊括的。比如军事、政治的稿件，过去虽然征集较多，但也不是没有薄弱环节。就以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打算编辑出版的抗战史料丛书来说吧，我们掌握的资料有六、七百万字，加上各地掌握的估计不下千万字，应当说资料够充分的了，可是一经分类选编，就发现我们的史料还有不少空缺。有的资料由于过去受“左”的影响，不能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现在有的作者要求抽回重写；有的看到我们的出版预告后，纷纷来信表示愿意提供资料或提供线索，这说明还是有潜力可挖的，至于军事、政治以外的资料，则有待我们以更大的努力去开拓

征集。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由于过去我们思想不够解放，视野狭窄，没有注意征集，现在应当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史料征集起来。今年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各业务组在研究加强征集工作问题时，都注意把视野放得宽些，更宽些。文化组的同志提出，打算以《走向文艺之路》为总题目，动员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把他们如何艰苦奋斗走上文艺之路的资料写出来，据说反映很好。用这种办法，可以调动撰稿者的积极性。社会组正在酝酿搞一个《名僧录》，到佛协去联系，他们也很积极，从三十多位名僧中选了十五、六人，并向我们提供了撰写人的线索。有些人可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也应当注意征集他们的材料，过去我们的征集工作局限于国内，对港澳和海外很少去触动，现在统一战线扩大了，开放政策进一步贯彻，国内外交往扩大，我们文史资料工作也应当做到海外去。那里是一个未开发的史料宝库，我们应当想方设法，积极加以开拓。

征集资料，实际上很多是带有“抢救”性质的。从广义上说，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召集六十岁以上老人开会就带有了“抢救”的性质。那时六十岁的人，现在已八十五岁了。现在我们讲“抢救”，主要是对年逾古稀而又有重要史料的重点人物来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紧迫感。煤炭、石油埋在地下，你不去开采它，它永远是宝藏。史料你不去抓紧征集，就会人亡史没。因此，这个问题必须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突出起来。要有全面规划，有力措施，和相应的政策，要有专人负责，争分夺秒，努力完成。再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贻误时机了。“抢救”确有一定的难度，同志们可以总结和互相交流经验。但不管怎么样，总离不开“三勤”，即：腿勤（登门拜访），嘴勤（向征集对象做思想工作），手勤（有材料就记录下来），做这个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你“抢救”了一份史料就立了一个功，“抢救”愈多，功劳愈大。

征集史料，以口述资料为主，但也不要放弃对函电、日记和照片等实物资料的征集，这些资料往往是口述资料的有力佐证。

关于征集的分工问题，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上曾规定：中共党史（包括军史）资料，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属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群众运动等史料仍由政协征集。当然这里面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必过于严格划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密切配合，只要我们不过多涉及纯党务工作就可以了。

第二，整理研究史料。

顾名思义，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不但负有征集资料的任务，而且负有研究资料的任务。当然这种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不相同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资料的整理进行研究，目的是把征集到手的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给历史研究部门提供丰富而可信的材料。

研究并不是高深莫测的事。我们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研究的成果。当我们审读稿件的时候，研究工作就开始了，比如鉴别史料的真伪，判断史料的价值，核实史料的情节，甚至评定稿酬，这都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工作。

当然研究工作不止于此。在资料征集已有一定基础的地方就要把资料工作提高到系统化、专题化的程度。所谓系统化、专题化，就是把纷繁而又零散的资料按照历史阶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按照历史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列成专题，逐步配套。比如我们征集的军事资料有三千九百万字之多，军事组的同志根据资料内容拟逐步整理出：（1）国民党对苏区的五次“围剿”，（2）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以上是内战时期），（3）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十二册（从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4）辽沈战役，（5）平津战役，（6）淮海战役（以上是解放战争时期）等专题资料。这样就把军事方面的资料成龙配套了。

地方政协要独立进行这样庞大的整理是困难的，但就某一方面的专题把资料系统起来则完全可以做到的。如西北诸省、区搞“五马”，广东省搞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广西自治区搞国民党桂系，天津市搞租界、洋行与买办，重庆搞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参政会等。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政协文史资料就会给我们的国家，给我

们后代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史料遗产。

实践证明，我们及时把整理研究、系统化专题化的任务提出来，有许多好处：1.可以摸清我们资料库存的底数，使多年积存的资料活用起来；2.可以针对我们现有资料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开展新的征集和“抢救”工作；3.可以及时请健在的当事人帮助我们核实、补充、订正材料；4.可以使我们的出版物在《选辑》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

第三，编辑出版史料。

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征集资料也好，整理研究资料也好，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资料提供给社会，为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文艺创作工作者所利用，这就要搞好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的出版物，不但要有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的质量。要确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把好“三关”。第一，要严格把好政治关，使我们的出版物有利于促进新时期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有利于两个文明的建设，而不是相反。第二，要把好史实关，史实要立准立好，要是非清楚，“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周总理语），不让谬种流传，祸及后人。第三，要把好文字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达到准确通顺。

开展书评活动，定期评选优秀文史读物，对优秀者给予精神和物质的鼓励，促使文史读物质量不断提高。

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同时强调实事求是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统一的方针。

爱国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与会同志和各方面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一致认为这个口号既符合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也符合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实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国家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广泛地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前夕举行的民主协商会议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作为政协工作组成部分的文史资料工作，毫无疑问应当同这种新情况相适应，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我们在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各个环节中，都要牢牢掌握和体现这个大方向，自觉地使我们的工作服从于和服务于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

爱国主义口号的提出，既是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同时它也是有深厚的历史实际为根据的。我们翻开近百年的史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康梁戊戌维新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不就是千百年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吗？在漫长的岁月里，多少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多少老一辈革命家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多少爱国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在困难险阻的环境中，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同党并肩作战，同舟共济，成为党的诤友；有的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进一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业绩，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辛亥革命以来无数革命先烈为榜样，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础，它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

强大动力。”

历史的作用是深远的。写一个人往往会影响一大片；写一代人会影响好几代。今年我们纪念陈嘉庚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派人到香港去组稿。他们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学生把我们派去的人当作祖国的使者那样热烈欢迎，盛情接待。有的人专程从新加坡来香港给我们写稿，有的派专人送稿子回国，积极提供陈嘉庚先生的珍贵照片和手迹等，积极协助我们向海外发行回忆陈嘉庚的书和画册。毛主席为陈嘉庚的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必将在海外上千万华侨、华裔中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的感情。我们文史资料发表了罗翼群（国民党元老，广东省政府原参事室副主任）的史料，其子罗祝年激动得流泪，一再表示：如果广东要搞核电站，他愿回来帮助。发表郭典三（辛亥烈士）和其女郭丁梅（红军烈士）的史料，他的两个在美国的孙子看到后以光荣家史引为自豪，表示要为祖国统一，实现四化，多作努力。发表了张伯苓（原南开大学校长）、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的史料，在其友好和学生中引起强烈反映，说“一篇传记温暖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不久前，我们为征集国民党的抗战史料，派人到昆明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有的人热泪盈眶，说“抗战死了那么多先烈，我们是在他们尸骨旁战斗，是幸存者，有责任把这些战斗经历写出来，不写就对不起这些先烈”。许多人从文史资料中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为国家民族做了一点好事，共产党就不会忘记他们，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们，从而感到无限温暖。这说明爱国主义具有多么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列宁说得好：“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三卷608页）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可以促进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思想基础。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体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扩大视野，进一步扩大征集面。六届政协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

极征集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过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的资料和各行各业中具有时代建树的人士的资料。”这些人士不是我们过去在“左”的目光下看到的一小圈，而是一大圈。这些人，不管他属于何种阶级、何种党派，只要他反帝反封建，主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我们都可以征集出版他们的史料；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要他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时代建树，我们就要肯定其功绩。毛主席曾讲过有四个人不要忘记，即：讲重工业不要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要忘记张謇，讲化工不要忘记范旭东，讲航运不要忘记卢作孚。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张之洞是知名的洋务派领袖，但他办工业对国家有好处，我们就要在这一点上给他写上一页。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并不排除写反面人物。我们写反面人物的目的并不在于把这个人物搞臭，而是为了分清历史是非，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以历史教训启迪今人，教育后代，这也就是利用反面教材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

实事求是我们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周总理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时就提出文史工作“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遵守这个原则。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强调呢？这是因为：第一，这是史料本身的要求，史料的价值在于真实，不真实等于废纸，甚至会贻害后人；第二，要做到真实很不容易，年老人难免记忆不准，就是“三亲”（亲身经历、亲闻、亲见）的事情，也可能只是表象而非本质；第三，由于种种原因，撰写人不能秉笔直书；第四，当事人的亲属、部属又往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过多溢美；第五，更重要的是，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只有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在国内外读者中树立威信，经得起千秋万代的考验。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会不会发生矛盾呢？和服从于、服务于总任务、总目标会不会发生矛盾呢？我们认为二者应当是统一而且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常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如：对历史上的“禁区”或有争议的人物如何处理？对某些爱国民主人士曲折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如何处理？对台湾国民党人士如何区别对待？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经验不多，还在探讨，希望大家都来研究。我个人想，作为资料，只要有史料价值的东西，我们都应当放手去征集，但在编辑出版的时候，则要考虑社会的政治效果，不能说有什么出什么。

所谓禁区，有许多是过去“左”的产物，今天我们要肃清“左”的残余，解放思想，一些不合时宜的“禁区”要拆除，把路子走宽。有争议的人物，我们不能主观臆断，而是要靠事实说话，要注意发现新的史料，经过核实，客观地提供出来，供史学界研究。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我们的着重点应是反映他们爱国、民主、进步的事迹。但他们的政治经历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辛亥以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的时代，推翻帝制以后，又有两次复辟；打倒旧军阀的人，又变成新军阀；国共有两次合作，又有两次分裂；过去同我们打过仗的人，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民主运动，或成了起义将领，有的在新中国担负了重要工作。总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各方面人物的浮沉，都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观察不能简单化、公式化，而要把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去处理，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在文稿处理上，为注意政治效果，有的问题可以粗写，有的可以从略，但不能改变历史事实。

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国民党有它的发展变化过程。有孙中山改组时期，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蒋介石篡权以后，背叛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国共合作时期，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御敌人侵略和推行某些民主措施的国民党；有国共分裂以后，对外妥协和对内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国民党中又有左、中、右的区别等等。对国民党人士信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在国共合作、北伐、抗日战争中作过贡献的，拥护祖国统